



## 我爱我爸

易碎物品

轻拿轻放

小心受潮

不可倒置

—— 摘自包装箱

### 1

我爸有两只可爱的眼睛，那两只眼睛一样大，一样地可爱，一样地像一朵花和另一朵花，就是两朵花了，两朵花一样的眼睛，笑的时候。我爸一笑，眼睛就像两朵花一样在脸上绽开了。第一次写作文，我就是这样写的，我就写了我爸的眼睛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哟。老师说，不能这么写，没有人形容过男人的眼睛可爱，从来没有人这么形容过，况且你爸的眼睛也不像你写的那样像两朵花。她傻乎乎地居然看不出来。妈到学校来接我，老师说了这事，期待着我妈同意她的意见，妈就同意了，说：“你爸的眼睛怎么会像两朵花呢？我看更像两个没有发育好永远也长不大的葱头。”我哇的一声就哭了，老师同情我，就用可怜兮兮

的眼睛看完我又望着我妈，妈就哄我说：“你爸的眼睛不像葱头。”我就不哭了。妈又说：“但也不像两朵花。”我又准备好了哭，妈叹口气，朝老师难为情地笑笑，拽起我的手，就难为情地说：“阿甘，别哭。”

一叫我阿甘，我就不哭了。

这时候该有笑声。果然就有了，总是班长带头笑起来，班长的笑声又大又脆又有爆发力，从最后一排座位一口气撞到黑板上，再从黑板上弹回来蹦得满屋都是，大家一起笑，大家喜欢阿甘，崇拜阿甘，就笑阿甘。然后同学们整齐地拍着桌子，整齐地跺着脚，有节奏地喊：“阿甘！阿甘！”

现在我可以直直腰，挺挺胸，跟妈妈回家了。回到家妈就说：“他爸，给阿甘改个名字吧。”爸不同意，说：“何必呢？”我也不同意，说：“何必呢？”爸就抚摸着我的头说：“就叫阿甘。”妈就同意了，像爸一样热乎乎地看着我，然后摇摇头。妈每回提议给我改名字都以同意结束，每回都摇头，摇头表示同意，这跟我已经取得的经验不大一样。

妈要给我改名字，这事儿发生好些日子了。过去无论谁叫我阿甘，都不见有过笑声，现在开始有了，那一定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是阿甘我高兴。后来，我爸好不容易让我弄明白，大家喜欢的阿甘跟我没关系，大家喜欢另一个阿甘，就是说，还有一个阿甘。我就问：“哪个阿甘，爸，是你吗？”要是我爸也不错，这样我跟我爸就都是阿甘了，肯定很不错。我喜欢生活里有笑声，不笑的日子该叫什么日子呀。

我爸说：“那个阿甘是个美国人。”然后我基本上知道了，那个碰巧也叫了阿甘的是个美国人。腿像我一样不好使。后来就非

常好了，跑得像兔子一样快。我也准备这样，再长大一些，再长高一些，就参加学校每年一回的运动会，到时候我一定跑得比兔子还快，就比较像我爸了。我说：“爸，我要跑，你就教我跑吧。”爸说：“儿子，再长大一些。”你看，我爸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再长大一些。长大需要一些时间，我有时间长大。

我爸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都知道他特别能跑，从甘家旺一口气跑到城关镇，就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学校读书，再从城关镇跑回甘家旺，像飞一样快，每天都能追上要下山的太阳。“像一只雄鹰，在地上狂奔。”爷爷说。爷爷那时还没死，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死了，一年级的時候他还在这个学校当名誉校长。爷爷把大老鹰说成是在地上跑的动物，跟所有人的经验都不一样，那就是差不多到了要死的时候。“鹰应该是在天上飞的。”我纠正过爷爷的错误，爷爷说：“你懂什么？你爸没翅膀，不飞。”

这涉及了知识，没翅膀就是不能飞的。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就问：“爷爷，人家都说你当年飞奔革命，你怎么就能飞呢？”爷爷说：“那是形容，你连形容都不懂？瞎！不懂也好，这世界就是给形容才弄坏了。”我又问：“爷爷飞奔革命，还当了排长？”爷爷不高兴，一到我把他当年职务弄低了就不高兴，说：“是连长，你怎么老说成是排长？”爸爸插话说：“你爷爷是副连长。”爷爷就不说话了，显然这比较精确，那就是副连长了。“想当年……”爷爷从一个像他一样老得没了样子的军壶里喝了一口酒，爷爷的老军壶里不装水，只盛了酒的，喝一口以后，就又要想当年了。这时候我就插话说：“我知道，你被你爸爸打出了甘家旺，所以你回来才不回甘家旺管他，让我爸爸伺候。”我这样一说，爷爷一般都要打个酒嗝，他就打了一个这样的酒嗝，歪着

头看我爸，说：“这孩子太傻，都是你给弄的！”

我爸就不说话了，疼爱地看着我，脸上有笑容，却不是好看的那种。爷爷一到这时候就把军壶使劲放到桌子上，长叹一声：“你呀……”我爸就说：“爸，别提了好不好？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知道，我爸也在纠正我爷爷的错误。从我能记住一些大人的话开始，爷爷就爱犯错误，这都跟爷爷打小爱喝酒有关。爷爷从部队回来当了甘家旺公社书记，跟他出去的七个人回来了三个，三个革命残废。有一年甘家旺饭量大的人差不多饿死一半了，爷爷就给县长打电话：“快送粮食来，不能让那三个革命退伍军人饿死！”县长说：“同志，勒紧裤带吧。”爷爷说：“那就快点儿送裤带来！”这事传出了甘家旺，爷爷就成了比较有名的人，我爸那年七岁，一九六〇年。我爸听说我爷爷支使人杀了国家的一头驴，星夜跑出甘家旺村跑到甘家旺公社，给他爷爷要一份驴肉，我爷爷说：“他是大地主，历史上早吃饱了！”我爸一路伤心地回到家里，抱着他爷爷哭。我爸喜欢他的爷爷，差不多像我喜欢我爸一样。我知道，我爸还喜欢他的大黄狗，那是一只传说中非常凶猛的狗，专爱咬人的脚脖子和脖子，但还算听话，只听我爸的话。狗当然是最听话的动物中的一种，人才喜欢。人总喜欢最凶狠的东西属于自己才好，别人拥有总不太放心，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我就不说了。只说一件事，就是我爸的爷爷六年后突然死的那天，我爷爷还是动了一点恻隐之心，经一种叫红卫兵的组织同意，回到甘家旺的家，一进院门大黄狗就扑了上去，爷爷吓坏了，我爸大声喊：“坐下！”我爷爷一屁股就坐门槛上了，大黄狗还站着。我爸说：“我让你坐下！”爷爷说：“我已经坐下了，儿子。”我爸有些气急败坏，或者触景生情，总之有点恨铁不成钢

的样子说：“站起来，爸。”

我爸从小能跑，而且从我爷爷那辈开始就比较听话又招人喜欢，我总算说明白了。现在可以说我想说的那部分了，就是我不喜欢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看别人在操场上跑来跑去，更不喜欢体育老师总安排我扔铅球，那玩意儿砸疼过我本来就不太好使的脚。我要跑，城关镇已经有了非常好的马路，不像过去那样尘土飞扬，因为城关镇已改成城关区了，我们县也不叫县，改成市了，时间不长，我还不习惯叫它城关区，喜欢叫它城关镇。我要在这镇上飞跑，太阳出来时用我软绵绵的脚在软绵绵的柏油路上飞奔，我爸不仅同意，而且支持我的想法，总说：“你能行，儿子。”

我能行，这很重要。镇上的人都开始知道阿甘了，那时候美国的阿甘还没有被装进铁盒子里来到我们镇上，现在他来了。我爸很吃力地让我弄明白，是美国的阿甘来了。我爸让我弄明白一些问题总是很吃力的，那天好不容易把那个阿甘快解释明白了的时候，我就问：“爸，他也是七个月就被生出来的吗？”我爸说：“可能是。”我妈说：“肯定不是。”爸就告诉我：“那个阿甘五个月就被生出来了。”我立即很高兴我比那个阿甘在妈妈肚子里多住了两个月，那个傻阿甘早早溜出来干吗呢？我这样一说，爸和妈都皆大欢喜，夸我聪明，然后我问：“那个阿甘也得过大脑炎吗？”爸说：“可能没有。”妈说：“肯定没有。”大人们总说，苦难是一种财富，那么我就比那个阿甘多有些财富了，这让人愉快，我说：“太好了，我得过。”爸和妈就不说话了，一到这时候，他们就不爱讲话了。爸和妈不讲话的时候，就是准备好了闹意见。于是他们就闹起意见来了，一般都是我妈先说：“那次你

要不是陪人去唱卡拉 OK，能把阿甘烧成大脑炎吗？”我爸说：“不是唱卡拉 OK，是斗棋，你怎么老说成是唱卡拉 OK 呢？”我妈说：“怎么不是唱卡拉 OK 呢？”我爸说：“再说大脑炎也不是发烧才得的。这几天省里和中央来的同志在咱这儿开会，赶上流感了，全在发烧呢，按你的说法，不都该成大脑炎了？”妈还在回顾她的问题，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大脑炎，我妈对任何事情都是很执著的，就执著地说：“对了，不是斗棋，是跳舞吧？你跟人斗棋那回，我怀阿甘才七个月，到医院去看他爷爷，就是那天一跤把阿甘给摔出来了，幸亏是在医院门口。”这就是我的出生经历，比美国的阿甘在妈妈肚子里多住了两个月的原因。“你去卡拉 OK 那回，我在厂里加班，他爷爷带阿甘去的医院，老糊涂了，才让那个大夫给阿甘打坏了，一针就给打到神经上了。”爸说：“不是大夫，大夫不管打针，是护士。”妈说：“什么护士呀，不就是原先曹县长的小姨子吗？头天还跟我在厂里拔鸭毛呢，那天就调到医院管打针了，阿甘才五岁呀……”

这就说到了我的历史，为什么我相信我能跑的原因，因为我曾经会跑过。这时候我爸总要拉住我的手，眼睛怪怪的，这时候我爸的眼睛就跟花没什么关系，但也不像我妈说的那样像葱头。妈不说话，用手抹着眼泪，然后背对着我们，肩膀在抖动。我爸这时候一般都站在我妈中间，向左看看，再向右看看，我知道往后发展的结局，就是要看手表。我爸看了一眼手表，说：“坏了，我表停了，现在几点？”我看了一眼闹钟，一点半，不一定要告诉我爸，这机会是妈妈的。“他妈，到底几点了？”我妈说：“你不会自己看？”爸就说：“不行啊，没有你我就一事无成。”我知道，这正是妈妈笑一笑的时候，她果然就笑了，“你就虚头巴

脑地说吧！那不，一点半了吗？”

妈被爸肯定成绩的时候，总是很高兴。爸也有理由笑一笑，就忘记了历史。历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会被提到，并恰到好处地根据不同需要去理解和使用，历史是武器，它从没有像大人说的那样做过镜子。不论何时何地，我爸只要稍有些得意忘形，我妈就会用我的历史让我爸无话可说，呆傻一阵子，然后我爸要设计一个细节，总能让我妈高兴起来，然后他们彼此都很感动。

我知道，妈和爸闹意见马上就会好了，我爸一般不让它过一天，或者一晚，一直到下次闹意见为止，周期长短不一，这全由我决定。有时候我总想，爸和妈一定是好到了非闹意见不可才决定结婚的。在一起过日子的人，一般都是很有意见的，所以才隔着一一条街、一座山、一条河或一个城市辛辛苦苦地住到一起，闹起意见来比较方便。我们家街坊黄叔叔就跟隔着三条街的第二个黄阿姨好到了要闹意见才住到一起的，跟第一个黄阿姨没啥意见，第一个黄阿姨不哼不哈地就走了，我们刚刚变成城市不久就走了。我爸管黄叔叔叫“〇〇七”，他们俩爱隔着墙头站在自己的院子里开玩笑。黄叔叔是文化局文化科文化办的文化管理员，是我们变成城市以后，在原先的县法院现在叫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七个离婚的人，所以叫“〇〇七”。现在已排到二百多号了。我表姐也是一个，她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人，在红旗电影院上班，主要是为来晚了的人用手电照着找座位。有一天照到了一个见到光就很灿烂的人，她就跟我表姐夫离了婚，随那个都说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去了美国，可听说表姐并没有跟那个人结婚，表姐夫知道这事儿。大院里的人都叫我表姐夫“二〇三”，表姐夫排在第二百零三号。爷爷死前还为这个生气，说“二〇三”是他们的老排

长——后来当了团长到东北打土匪时定的代号，现在的人可真不像话。第二个黄阿姨不再到我们镇上第一家谁都可以进去歌唱一阵子的地方上班后，搬进了黄叔叔家，这样黄叔叔跟她闹起意见来比较方便，我半夜里经常被黄叔叔家砸锅摔盆的声音吵醒，现在我又被吵醒了。我妈说：“老黄家又怎么了？”我爸说：“〇〇七又侦察到什么新目标了，咱这儿已开了二十多家歌厅了。”我妈说：“不是吧？老黄的女人晚上不爱睡觉，中午才起床，下午就哪儿都找不着她。老黄生气了。”这时候锅又被摔了一次，我爸笑着说：“〇〇七总让我想起一九五八年。”妈就笑了。我不知道这一九五八年有什么好笑的，说：“爸，该起床了，九点钟我要看阿甘。”爸给吓了一跳，说：“儿子，你吓死我了，没睡着？”我就告诉我爸我被一九五八年吵醒了，妈就说：“他爸，以后可别当着阿甘瞎说。”我说：“我没瞎说，我爸说好了要带我看阿甘去。”我爸很夸张地拍了一下脑门，“坏了，儿子，九点半我得去火车站接人，下礼拜天再去看电影好不好？”我知道我爸说话从来不算数的，妈也知道，说：“这回就是上个礼拜天挪过来的，他爸，你就别去接了。”爸说：“不行啊，北京又来人了，中央的，我不去不行。”妈就笑了，说：“我说你呀，怎么凡是北京来的你就认准了是中央的而且代表中央？你斗棋那回的张处长，你不是说他也是中央的，可你前年在北京看见他骑着自行车上班？中央的哪儿有骑自行车上班的？”我爸说：“有，张处长就是。”我妈说：“张处长是农业部下面一个局再下面的一个处的处长，不一定跟中央关系那么近。他爸，赶明儿真来个中央的，我看你该怎么办？陪人家斗棋？不，人家喜欢桥牌；跳舞？也不行，北京有那么多部队歌舞团；喝酒你不一定是对手；还唱卡拉 OK？人家

要是把调儿定太高了，你唱得上去吗？你要唱不地道，咱县，不，你这甜水湾市的三陪先生不就栽了？”爸使劲卜楞着脑袋，好像耳朵上吊着一只蝎子似的摇晃，说：“真难听！太难听了，这叫什么话？”妈捧住了爸的脸，说：“别摇了，他爸，带儿子看电影去。”我赶紧说：“爸，我要看电影。”

我爸就把我带到了红旗电影院——现在已叫巴比伦娱乐中心了。我的二〇三表姐夫看见我爸，忙说：“姑夫，今天有空啦？”我爸说：“我正要找你呢，电影散场后，你把阿甘送回家去，我得去车站接人。”二〇三姐夫说：“怕是不行，今天来了一帮老爷子，原来的曹县长，原人大窦主任，原政协谭主席，都自个儿来了。”正说着，我爸就看见了曹县长，曹县长也看见了我爸，曹县长原先笑着的脸一下就不笑了，我爸没准备笑的眼一下就成了两朵花，说：“曹县长您来啦？”曹县长说：“怎么，我不能来？老子花钱看电影还要跟谁请示吗？”我爸笑着说：“瞧您老说的，后天就是元旦，明儿个要请您出席茶话会呢，还有电影专场，我昨儿不是去请过您老了吗？”曹县长用拐杖使劲戳着地，说：“一到元旦就把我们这一串老帮子拎出来，娘的不过年不过节就以为我们死了？合着每年就活一回？”我爸笑着，一直保持着笑容，曹爷爷的拐杖每一下都戳在我爸的脚上，我就说：“爷爷，你把我爸的脚弄疼了。”曹爷爷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然后他就向里面走了，边走边说：“陪儿子，好，你陪儿子，我今儿不跟你计较。”

灯渐渐开始变暗，我不知道我爸是否还在保持着笑，但我知道曹爷爷习惯表现出痛苦或失落给我爸看，这事儿已好几次了，但曹爷爷也只是说说而已，从未真的对我爸扬起过拐杖。我总以

为早晚有一天曹爷爷会把我爸打一顿，到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不要上手帮我爸。表姐夫大概也这么认为，打人的事还没有发生。

二〇三姐夫说：“姑父也真是，你干吗非今天来这儿看电影，替人挨骂？”我爸说：“这是工作，我的。”然后我爸把我领到后面的座位上，说了一堆好话，主要的意思是看完电影我别走，他会来接我，别让我妈知道他没陪着我看电影的事儿，怕妈生气。妈今天加班，省里来了外贸局的人到羽绒厂检查，我爸怕羽绒被子里万一有一只鸭头我妈没摸出来，影响的就不是我们的城市，是国家，会造成国际影响。我知道我爸的意思，就是变成城市以后马路就不让随便走了，在巴比伦门前架起了一座桥，我确实不喜欢这座桥，又高又长，没有一个台阶符合我的脚步，也不一定符合别人的脚步。电影开始了。我看了一个多小时也叫阿甘的人，就知道他跟我没关系，我跟他也没关系，但我喜欢他的船。我坐在巴比伦门口，第二场电影快散了的时候我爸才来，我就说：“爸，给我买一条船。”爸有什么心事，边想着心事边问：“什么船？”我说：“那个阿甘那样的船。”我爸听懂了，笑了笑，不准备带我去商店，摸着我的头笑嘻嘻地说：“那是一条好大的船哟。”我说：“爸你真傻，我要小的，能放进书包里的。”爸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说出了他的意思：“儿子，你书包里有那么多课本，每个课本还有两套作业本、两套练习本，还有学校让买的课外书和参考书，对了，还有改成城市以后学校搞的课间加餐，就是说还有一个饭盒。儿子，听懂了吧？我是说你书包里再放不进去一条船。”这倒是真的，爸说的没错，我要说的是：“爸你还是太傻了，我不会拿手里吗？”

爸愣了一下，把我背上了过街天桥，下了桥，穿过两条胡

同，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才分析完他是不是太傻，说：“儿子，等你长大了，要像那个阿甘那样自己买一条船才是。”我说：“不行，爸，我当不了兵，没法儿弄到退伍费，也不能像爷爷那样把退伍费买了课桌和板凳。”爸蹲下身子，用脸贴住了我的脸，悄声说：“儿子，等你长大了肯定能当兵，都现代化了，万一打仗，坐在计算机室里就能打赢一场战斗。”我很高兴未来难免会有的那场战斗，说：“爸，那我不用像那个阿甘那样把班长从阵地上背出来了吧？”

这时候我提到了班长，像我开始说的那样，回到了班长身上，一叫我阿甘就傻乎乎带头笑的班长。爸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我爸知道我的想法，就是我不喜欢我们班长，如果当了兵，赶上那个阿甘赶上的事，不一定会把班长背出来，该让他爸爸去。他爸爸现在是市长，原先是省粮食局的局长，我们县还叫县的时候就当县长了，然后就变成了市长。看来我们县变成市以后，还是要生产粮食的。城关镇比原先大了，我们学校原先在县城边上，现在差不多快成市中心了，可还是需要一个懂粮食的人来当市长，我们才放心，不会发生我爷爷赶上的事儿。我爸和他爸在一个楼里上班，他爸管我爸，他管我，总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他爸还被叫做县长的时候，就总让我爸到火车站接人。我刚上一年级的時候，有一天看见我爸总接人的那辆汽车不自己走，我爸在后面推着进了还叫县政府招待所的大门——现在已叫菲林格亚宾馆了的那个大门，我就问妈：“我爸为什么要推汽车？”我妈从学校接我回家，那时候城关镇还没有那么多过马路的桥，我和妈并不是站在高处看见这事儿，知道我看见了，我妈就很想把这事解释清楚，说：“你爸爸是公仆呀！”这就是比较明确的概括

了，像今天班主任老师说的，主要是对我和刚转来像我一样笨的外省的同学说，一年里你们学了那么厚一本书，现在就用两张纸告诉我你们学明白了什么吧，老师概括起来只是四个字：你们完了。老师从当老师那天起，就是专门为难我们学生的，可我爸也当过老师，就在这个学校，难道不当老师以后的爸爸就要让别人为难了吗？这样我就不明白了，问我妈：“那为什么我们班长的爸爸不下来一起推车呢？”我妈给问住了，想了半天，忽然有了主意和说法，妈就说：“他是人民的公仆啊。”

到家了。

## 2

我爸很会给我解决午餐问题，不一会儿，他就端出一碗热乎乎的方便面，上面还滴了几滴香油和醋，我知道，做完这些他就该走了。我爸就走了，肯定又是陪客人去吃饭。我爸每回从车站接来一个客人，一般都是由十九个人陪着，围着两张大桌子坐了，这时候我爸就不再是重要人物。客人也从不误解这点，只是密切关注我爸是不是给我们班长的爸爸往酒杯里倒矿泉水。肯定有一次我爸被人抓住了，我爸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那还是曹县长当县长的时候，我爷爷那时还没死，只是送了一张病危通知书，我妈带我去找我爸，我看见了那十九个人和两张大桌子，我爸站在客人面前，把一大杯白酒喝了。这让我妈吓了一跳，因为我爸不会喝酒。我爸从爷爷那儿继承了很多东西，惟喝酒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那是个夏天，我妈拉着我的手在窗户外面望着屋里，听见我爸说：“张处长，我真的不能喝了，眼睛都看不清了。”张

处长说：“这可没法儿证实，你不喝就得罚老曹。”我爸这时就求助似的看了看屋里的人，希望有人来救他。当然那想法很幼稚，所有的人都没看他，齐齐地望着张处长，我爸便望向了窗外，没有看见我妈和我，看见了天上有太阳，我爸说：“月亮都上来了，张处长，去唱卡拉 OK 吧。”曹县长说：“什么月亮？是太阳。”这真让我震惊，因为这时候是中午两点，我爸已经日月不分了。我爸坚持着说：“就是……月亮，张……处长，你说呢？”张处长使劲地摇摇头，大声说：“不知道，我……不是本地人。”

这时候就爆发了笑声，像我们教室那样，笑声在四处爆炸了。我妈就拉着我赶紧走了，我问：“妈，那个张处长是哪儿的人？”我妈说：“北京的，中央的，农业部的，农业局的，农业处的。”妈近乎要说胡话了，我还能听懂。

那天，我妈很高兴把我爸推汽车的事儿说清楚了，我爸不当老师以后，到政府里做了公仆，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推汽车。我妈说，我爸到政府里做事儿，还是那个张处长促成的呢，至少我爸有天赋，会斗棋。在我们这儿，都管下棋叫“斗棋”。要说斗棋，就不能不说到我的老家，我爸的故乡，将来我有儿子以后也不能不总提到的祖籍：甘家旺。她属于甜水湾县的时候就很美丽，属于甜水湾市以后就不一定不美丽了。我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形容她，因为说到美丽人们都懂，也比较好了解，比如说玛丽莲·梦露——她挂在我们体育老师宿舍的墙上，都说她美丽，人们一下就明白了。如果老师知道我这样说，又要批评我不能这么形容，也许我真的不太会形容，不管怎样，我总算把美丽说清楚了，其实美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奇。

我的家乡很神奇。如果说“美丽”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看到一

只烤全羊的话，“神奇”便是一个饿鬼碰到了一整头红烧骆驼。（我真的不太会形容，就请原谅吧。）我想说的大概意思是，就是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你再往前走的时候，早晚会突然看见一座山，那山好像是突然间就出现的，突然间拔地而起，让你毫无准备。属于我爷爷的甘家旺，就在那山上。上了山以后，你将几天几夜走不出那山，好像以后就全是山了。我不知有多大，有多远，我不知道就不准备说了，一个人说他不知道的东西，必是属于胡说。爷爷死前有一件事很不明白，就是甘家旺的人不再提共产主义了，但整个甜水湾的人都知道，不提那个共产主义以后甘家旺开始变得更美丽了，更像甘家旺了，甜水湾县变成市以后，很高兴继续拥抱她。

甘家旺多少代人都喜欢往山下看，吧唧着嘴有些心痛地看着山上道道清泉流到山下，流进城关镇，流出甜水湾，用不了多久就进入黄河了。有山有水，按爷爷的说法还有“阿娘河”，再也没有把故乡安排在这儿更让人满意的了。爷爷说，在他之前，甘家旺差不多平静了一百年，甘家旺不要说没有出过八路军，没人当过国民党兵，历史上就连个像模像样的土匪都没出过。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了差不多好些日子以后，甘家旺的人才知道中国没有皇帝了，不过还是要纳贡，所以有没有皇帝对甘家旺的人来说并不重要，差不多都一样，这是规矩。人在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就早有先出来的人为后面的人精心地安排好了各式各样的规矩，这我知道，不一定要爷爷告诉我。我们甜水湾变成市以后，规矩就比过去多了，说出来不一定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比甜水湾早十年变成市的那个邻县，他们号召市民不许随地吐痰的时候，甜水湾正大张旗鼓地禁止随地大小便，这就是我们变成市以

后城关镇多了许多漂亮厕所的原因。我爸对这事儿有解释，主要是针对那成千上万到我们城市来盖大楼的民工提出来的，他们来建设我们的城市，不能对远方来的客人说，别在我家地上“出恭”。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应当原谅她成长中的过失，比如很多像公园售票亭一样漂亮的厕所，刚建好不久又被拆了，因为要扩建公路，它显得碍事了。市规划局局长得糖尿病死了，都说他不死也得给人打死，因为他的失误，给甜水湾造成了一次巨大的开支，浪费了，自己却没事儿一样地死了。自从县政府的牌子换成市人民政府的牌子后，城关镇的人想法多了，问题多了，脾气也变大了。

我大概把我们甜水湾市说清楚了，她一大部分在平原，还有不一定很小的部分在山里。甘家旺属于甜水湾的一部分。我爸的爷爷在历史上就是甘家旺很有影响的人物，为了便于识别和让人记住，后来大人们对我老祖父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比较容易明白，叫“地主”。我的地主老祖父过去甘家旺人都称他“东家”，他后来叫地主、大地主、恶霸地主，死了。不是病死也不是老死，不是被政府枪毙也不是被台湾派来的国民党特务杀害，是被山外新兴的现代土匪给宰了。我爷爷说他爸的死是最窝囊最让人憋气的死法。爷爷还说，甘家旺的人都为爷爷的死痛心疾首，这跟我课文里的说法不太一样。爷爷被大黄狗吓着那天，村里的广播正宣读毛主席对这种事儿的看法，说有的人死了重于泰山，有的人死了轻于鸿毛。爷爷提到了一个叫张思德的人，这人我不认识也不知道，好像是为了抢救砖头才英勇献身了。总之，甘家旺的人统一了认识，我猜想那一天甘家旺的人都看到了一根鸿毛飘出了山外，也许就像我看阿甘电影时一头一尾都出现的那根鸿

毛，或者是鹅毛鸭毛或鸡毛，正是我妈所在工厂做的工作。妈妈在羽绒厂上班，每天都要给动物拔毛，然后把毛缝进衣服或被子里，好暖和人的身子。

我爷爷分析过他爸爸死了甘家旺人痛心疾首的原因，是因为甘家旺死了久负盛名的“老棋王”。那么甘家旺的人打量完飘出山外的一根毛之后，一定十分注意我爷爷家一副据说已传了一百年的翡翠象棋。我和我爸及爷爷确实都没见过那副翡翠象棋。那副翡翠象棋没有传下来，但如何摆弄它的技巧我爷爷早已心领神会。爷爷说，从他记事开始，甘家旺一到冬季就摆开斗棋战场，在我老祖父的大宅院里设局，十村八乡的人都来，老祖父还管饭，不管认不认识，有没有身份，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会斗棋的都可以来斗。这是甘家旺玉米收仓、麦子播种后整整一个冬季的乐子，直斗到过年才会出现第一名，然后可以向我老祖父挑战了。老祖父已是二十年的“老棋王”了。老祖父还要请来戏班子在甘家旺唱七天七夜的戏，无论种地的还是收粮的都有酒喝，有肉吃，就是说过年有七天七夜的费用是我老祖父出的，每天开戏前在村里大庙前的大台子上斗棋。我爸说，我爷爷当年可不是“飞奔”革命的，是被我老祖父用一根枣木棍子打出了山外。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老祖父输了一盘不该输的棋。甘家旺种地最好的手艺人挑战我老祖父，爷爷支了一个阴招儿，是因为十八岁的爷爷看上了那人的女儿，想提前讨未来老岳父的喜欢，让老祖父不开心，就让他出去到山外革命一阵子，来年春天再回来。爷爷不肯，因为爷爷除了有自己关于女人的心事，还有二十个十里八乡不服爷爷斗棋的人，爷爷是十八岁以下人中的高手，被他爸用枣木棍打出甘家旺的那个早晨，还有七个甘家旺十六七岁

的伙伴追随而出。爷爷带着他们兴高采烈地出了山，带着象棋，那时火车还没有铺到甜水湾，他们一路看山外乱哄哄的世界，一路斗棋玩，到了邻县火车站的那晚就要决出冠军了，没想到被抓了壮丁，当晚就上了战场，天没亮就被俘虏了。爷爷的老排长——就是后来的二〇三首长问爷爷：“回家？还是革命？”爷爷说：“不能回家。明年夏天我爸才让我回去拔麦子，就先革命吧。”老排长拍了拍我爷爷的肩头，说：“好！不过，打仗带枪就行了，别带着象棋，等革命胜利了你再去斗吧。”

爷爷后来总结他的一生说，是斗棋才让他革命的，也算是因祸得福，要不甘家旺解放的时候，他肯定当不了公社书记。如果留在甘家旺，不被国民党杀害也被共产党给毙了，要不一九六六年也得让比他更“革命”的人给收拾了。我大概说清楚了，我爸从他爷爷死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我爷爷往据说是牛棚的一种棚子里送饭，必是我爷爷教会了我爸下棋，希望有一天我爸也能有个什么奇迹来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奇迹果然就出现了。我爸还在城关镇小学当老师的时候，有一天曹县长来找他，叫他陪北京来的一个客人下棋。这人就是不能分析出是太阳还是月亮的张处长，因为他不是我们甜水湾的人，来自外地，北京，可人们都说张处长为把我们县变成市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点像我爸。大人们总喜欢夸大事情，夸大了的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再用一定也不简单的心情来解释被大人们故意弄乱的事。他们夸我爸，大概就属于这个性质。

我爸说，事情的起因是张处长来我们县检查工作，吃完晚饭后心情总不太好，因为那时甜水湾还不像现在有那么热闹处。那时人们最大的乐子就是下棋，至少是乐子中的一种，张处长很